

# 抗战 外援

1937—1945年的  
外国援助  
与中日货币战

[美] 阿瑟·N·杨格——著 李雯雯——译 于杰——校译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抗战外援

1937—1945年的  
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美]阿瑟·N·杨格——著 李雯雯——译 于杰——校译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  
(美)阿瑟·N.杨格著；李雯雯译；于杰校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9  
ISBN 978-7-220-11409-0

①抗… Ⅱ. ①阿… ②李… ③于… Ⅲ. ①货币史  
— 研究— 中国— 1937—1945 Ⅳ.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8355号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Copyright©196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pyright©renewed 1991 by Elizabeth Y. Roula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9  
by Beijing Skycloud Culture Promot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进]21-2019-281

## 抗战外援：

### 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KANGZHAN WAIYUAN

1937-1945NIAN DE WAIGUO YUANZHU YU ZHONGRI HUOBIZHAN

[美]阿瑟·N.杨格 著 李雯雯 译 于 杰 校译

出品人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冯 珺 蒋科兰  
张 科  
戴雨虹  
袁晓红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46mm × 210mm  
17.25  
450 千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0-11409-0  
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阿瑟·N. 杨格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顾问

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963

## 推荐序

# 烧钱的抗战

自蒋介石于 1927 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到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恰好十年。此十年间，虽然国际、国内风云不断，但中国仍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有“黄金十年”的评价。但日本入侵彻底改变了这种局势。

战争需要钱。国民政府十年的积累，并不足以应付长年抗战。其维系战争开支的方式，一是在国内筹借。前政府留下来庞大债务，社会经济虽在过去几年有起色，但远未及殷实，政府唯一的筹款方式就是通过国家银行垫款，此举导致货币发行剧增及后继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笔者翻译的《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张嘉璈）的内容；再者就是依赖外援，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即本书记录的内容。这些外国援助中，除直接的军事支持外（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派驻军队），更多是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领导人近年常提及的两国友好关系历史。

在英、美相继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退出金本位之后，中国于 1935 年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采用外汇本位的法币。政府此前储备的白银及大部分民间白银，成为美国援助的交易品，为中国的抗战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抗战持续和美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法币的外汇本位逐渐变成了美元本位，此间的中国实质上进入了美元体系。二战行将结束时，美国即着手战后体系（经济上即为美元体系）的建立，这些体系虽经调整，但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其时，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参与了这些

体系筹建，但因为国内形势的影响，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关于过去一百年世界货币机制的大致变迁，可参阅《通胀螺旋》《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

对任何政府当局来说，从贵金属本位转变为外汇本位，在汇率问题上都是一个挑战。抗战对中国国力的消耗，则更加剧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困境。就官方汇率是该“跟随”市场还是由政府统制，中国官员之间、中美之间乃至美国政府内部都存在争论。杨格和张嘉璈对此同样有着不同的看法，读者读过两本书之后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个争论对当下的中国同样有价值。

中日两国在战场阵地战之外，还有着货币之间的争战，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教科书一般的案例。国民政府的应对可圈可点，当时的外国租界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当属外国援助的一部分。

除了财政、金融和货币记录之外，本书关于军事、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也颇具价值，当然无不与钱有关。作者杨格是美国人，为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顾问达数十年之久，在中国抗战结束回到美国之后，又被聘为中国中央银行顾问，其应该是为国民政府服务时间最长的外国人。杨格在中国的币制改革、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寻求美国援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时，对英、美两国所提方案的反馈，即以杨格的意见为蓝本，他本人也代表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其特殊身份，本书的内容不仅涵盖了中、美两国大量的一手资料，更有他本人收集的相关国家，如苏联、日本和德国等的资料。这是国内相关书籍不能比拟的，相信也是本书英文版被国内专家相继引用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国近代经贸关系的真正缘起正是二战之前，中国的币制改革、世界货币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将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

20 世纪后半期乃至当下的世界格局。重读 70 年前的历史，对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思考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近 60 年前，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东亚系列丛书的第十二本。四川为中国战时后方的中心，本书中文版能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适得其所。在我策划翻译的几本书中，《抗战外援》是周折最多的，从版权到出版，说起来是故事，经历起来都是辛苦。为此要特别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的慧眼及为出版本书付出的奔波之苦；感谢杨立主任支持。感谢北京天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朋友们，特别是罗菡女士，没有她的付出，读者们可能至今见不到这本书。感谢李雯雯的出色翻译。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先生、副总经理潘岳女士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先生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读好书，免于无知。珍惜和感谢那些为我们出版好书付出辛苦的朋友们。

于杰

初稿于 2018 年 4 月

修改于 2019 年 2 月

## 前 言

在1929—1947年这一重要历史时期，阿瑟·N. 杨格作为中华民国的财政顾问，他的贡献兼有传统和现代两种色彩。一方面，和马可·波罗、罗伯特·赫德一样，他是受邀工作于国民政府的外国专家，因而得以从权力阶层内部人士的角度观察当时的中国。另一方面，他又是当时新兴的对外经济援助领域的先行者，不仅每天研究如何应对战争期间不断出现的危机，还常常代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打交道。

杨格先生个人关于国民政府财政问题和政策的记录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他基于这些记录以及其他资料对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不仅将美国的援助项目置于外国对华援助的总体背景下，还从接受援助一方的角度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审视。

杨格先生出生于洛杉矶，毕业于西方学院，先后自普林斯顿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法律学位。结束普林斯顿的教职后，他于1918年在拉美国家——墨西哥和洪都拉斯开始了他的财政顾问生涯。1947年离开中国后，他继续致力于财政事务，服务过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1922—1928年，也就是他赴华受聘于当时仍颇有前途的早期国民政府之前，他一直是美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凭借以往的经验，他在意识到汪伪南京政府势力上升的同时，也发现了美国与重庆国民政府所结成的战争同盟势力的衰退。他对中国所

获得的援助，以及这些援助的不足，乃至在中国的使用和误用，进行了冷静、理智的反思，既为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论题提供了真实记录，也对一个悲剧性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做出了深刻解读。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 引言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北平卢沟桥的军事对抗导致了一场全面冲突，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次事件牵涉方方面面，影响巨大。当时主要有三种揣测：中国及其5亿民众会沦为日本的牺牲品吗？中国会与苏联结盟并信仰共产主义吗？抑或，中国为争取独立自主所付出的充满希望却极不稳定的努力会获得成功吗？

孤立无援的中国不可能持久作战，来自海外的援助（这些援助的时间、性质、范围及中国可能的使用方式）十分重要。中国的领导人自抗战之初就认为，为了自由、正义，以及未来得以创造一个能保障人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世界，中国将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并忍受深重的苦难。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对的。

在日本于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东北之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该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哪怕必须以战争为代价。那么，战争也许是能够避免的。美国和包括德国、苏联在内的整个欧洲当时都反对日本的行为。若是采取坚定的联合行动，没准儿还能预防墨索里尼甚至是希特勒后来的冒险。然而，截至1937年，日本已成功实施了长达六年的侵略计划。唯有强大的武力，或者以此相威胁，才能阻止日本当时在中国的冒险。日本也许会因此打退堂鼓，毕竟很多日本人也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即便那时爆发了战争，结果也不会像后来的抗战那般惨烈。坚定的行动很值得冒险一试。但是，到了1937年，联合起来遏制日本要比

1931年的时候困难得多。不幸的是，日本算准了国际形势。

本书讲述了自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多的战争期间，中国的自救努力和其他国家的援华行动，以及中国和这些国家未竟之事。全书以金融、经济和国际事务，尤其是那些我得以参与的事务为中心，同时涉及内政和军务。我在书中试着用非专业语言将这一切呈现给普通读者。此外，还有一本专业性较强却与本书密切相关的著作，主要讲述了同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和货币状况，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中国的战时财政，1937—1945》（*China's Wartime Finance, 1937—1945*）。

中国此间的众多事件为战后世界一些重大事务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在《国际联盟盟约》所谓“现代社会的艰苦条件下”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强烈的国家主义影响、自力更生和外来援助的作用、援助的及时性、与西方援助对应的苏联援助、援助是否应附加条件，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因为通货膨胀会影响经济、内部稳定性、外来援助和国际关系）。本书提供的经验至少会让人明白，想成功解决棘手的援助两面性问题，需要有关人士具备最高水准的理解力、协作精神、能力和意志，而在此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

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以及共党政权的取而代之，业已成为一个辩论的话题，这种论战往往带有情感倾向性，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真相的探知受到诸多怀疑的干扰，我们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将遭受阻碍。中国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主要从战争期间来分析，因为战争开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还没完全成熟。借助可获得的同时期相关记录，我试着在书中说清楚在那些悲惨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因为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单纯陈述事实不仅会令人兴味索然，其史料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作为置身于这些震撼人心事件旋涡中心的人，我清楚中国在战争期

间遭遇的苦难。考虑到这一关键时期日本军力的压倒性优势、封锁、外部援助的迟缓和不足，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抵抗几近奇迹。所以在 1937 年的时候，甚至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的抵抗可以撑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那时如果有人表示中国将单独对日作战超过四年，并且继续抵抗超过八年，此人多半被视为轻率的预言家。令人惊叹的不是其中历经的失败和不堪，而是中国人支撑到了整场战争结束。我想起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 1863 年 3 月写的关于林肯的文章：“我钦佩总统……我不会总抓着他执政时所谓的失败不放；我有时觉得他在维持巨轮正常航行的过程中展现了近乎神奇的才能。”<sup>①</sup> 如果我有机会批评中国的行动和过失，那也是一个老朋友的批评，我因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必须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面对战争期间的严峻考验并承受此后的持续磨难而痛心疾首。既然中国存在“历史周期律”，就让我们期待中国人民摆脱困境、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的那一天。

来说一说日本。我在书中屡次强烈谴责该国那些年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对于许多日本人，我完全是尊重的。他们或是对侵略行径抱有抵触或否定态度，或是在无意间被卷入战争乱局。我不希望任何人将我的谴责视为对这些人或者对当下之日本的想法，后者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友好成员，令人欣慰。我从战后日本人的视角，引用一下分别是空军将领和飞机设计师的奥宫正武和堀越二郎在《零战！》中对空战的叙述：

这是现代日本的悲剧：那些试图遵循“公平竞技”这一国际行

---

<sup>①</sup> 引自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 one volume editi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New York, 1954), p. 401。(此为作者原注，本书未经特别注明，均为作者原注。——译者注)

为准则的伟大、仁爱的政治家往往遭遇灭顶之灾，而由这类人组成的几任内阁又迫于好战分子的压力败下阵来……

没有哪个日本国民可以边回想这些年所发生的事，边为我们国家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没有人能否认那些记录，因为历史只会说日本逼迫其友好邻邦卷入一场既不理智也非必要的战争，令他们的乡村和城市沦为战场，导致了数百万无辜平民的不幸和贫困。<sup>①</sup>

本书既是历史，也是回忆录。资料来源上，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外，我还使用了我在1929—1947年担任中国财政顾问的近19年时间里收集并完整保存的文件资料。这一时期，我待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了14年，其他时间则是在美国处理中国事务或休假。这些资料的使用已经征得了中国方面的同意，由于战时和战后大量官方记录的遗失，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比现存的其他地方的记录都要完整。而且，我还获准查询美国国务院记录和国防部相关数据。我也大量查阅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资料库中的《摩根索日记》。自从1956年宣了誓，该委员会就允许我不受限制地查阅其资料库。我当时看到的资料应该囊括了美国财政部在1940—1945年对华交往期间最重要的内容。我试图查阅《摩根索日记》中涉及中日战争时期的其他部分，但这些内容在1965年之前禁阅，仅对摩根索先生及其代理人开放<sup>②</sup>。此外，我也使用了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战时出版的官方和私人资料中的大量内容。为了更加深入地阐明本书主题，我与很多事件亲历者进行了交流，其中包括中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我本身也是亲历者，但我还是

① Okumiya and Horikoshi, with Martin Caidin, *Zero!* (New York, 1957), pp.9, 24.

② 这些日记于罗斯福的连续任期届满25年后对学者开放。参见J. M.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 1928-1938*(Boston, 1959), p. x。

力求客观。我是否在所有内容上都做到了公正将由读者来评判。不过，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希望是由于对某些事实的无知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阿瑟·N. 杨格

1963 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诺市

## 致 谢

感谢美国、英国的出版人士和作家经纪人，他们允许我在书中引用相关著作：布兰特与布兰特公司，威廉·D·莱希，《我在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A. S. 埃弗里斯特，《摩根索，新政与白银》；陆军部，C. F. 罗马纳斯与赖利·桑德兰，《史迪威的中国使命》《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和《最后的中缅印战区》，华盛顿州，1953年，1956年，1959年，二战美国陆军史系列，陆军部军事史第一办公室出版；E. P. 达顿公司与卡斯尔公司，奥宫正武、堀越二郎与马丁·卡丁，《零战！》；哈考特与布雷斯世界公司，米洛万·吉拉斯，《对话斯大林》，以及桑德堡，《亚伯拉罕·林肯：大草原与战争岁月》；哈珀（外交关系委员会），W. L. 兰格与S. E. 格里森，《不宣而战》；管理不列颠女王陛下文具办公室，S. W. 柯比，《抗日战争》第二卷；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公司，A. C.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霍顿·米夫林公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紧缩包围圈》和J. M. 布卢姆，从《摩根索日记探秘：危机岁月，1928—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1929》；G. P. 帕特南子孙公司，陈纳德，《战士之路》；亨利·勒涅里公司，唐·洛贝克，《帕特里克·J. 赫尔利》；威廉伙伴公司，《史迪威文集》，约瑟夫·W. 史迪威著，西奥多·H. 怀特整理并编辑，威妮弗雷德·A. 史迪威1948年授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W. F. 克雷文与J. L. 凯特，《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第一、四、五、七卷，芝加哥大学1948年、1950年、1953年、

1958 年分别授权。

感谢以下人员，他们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并为完善本书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J. B. 康德利夫和李卓敏；亨廷顿纪念图书馆的艾伦·内文斯；中国银行前官员和中国中央银行前总裁贝祖诒；我的前同事、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前司长和前国务卿顾问亨培克，我曾和他讨论过很多问题，他作为这些事件核心成员的经历对我理解它们有很大帮助。同时，就批判性阅读手稿并提供宝贵建议而言，我要感谢曾在中国负责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 W. L. 邦德，曾在南京大学执教的卜凯，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农业专员欧文·L. 道森；曾工作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中国盐务总局前财政顾问和会办罗哈脱，以及美国前驻华陆军拉尔夫·L. 鲍威尔。

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监督了本书的此次发行、承担了部分相关费用并帮忙准备了出版所需手稿。我尤其感激中心的费正清教授，他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有益的建议，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和支持，并推动了本书的出版。在如何更好地说明一个复杂主题方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建议十分有帮助。我还要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他们提供的学术奖金和补助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鼓励。

感谢以下人员，他们允许我查阅美国政府的文献资料，并为这些资料的使用提供了帮助：国务院历史部门负责人 G. 伯纳德·诺布尔及该部门的 E. 泰勒·帕克斯，国务院剩余资产和租借援助司司长弗朗西斯·T. 墨菲，国防部军事史办公室的鲁思·斯托特，国会图书馆东方史料组组长小埃德温·G. 比尔，以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调查《国内安全法》施行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

感谢以下人员，他们在很多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曾供职横浜正金银行的荒井伸二和海老原竹之助、日本银行的关根太郎，以及日本防卫厅；耶鲁大学的约翰·莫顿·布卢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多萝西·博格；斯坦福大学的伯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J. C. 布托；纽约城市学院的杰尔姆·B. 科恩；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尔利赫；中国金融领域的资深权威耿爱德；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顾翊群；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小道格拉斯·H. 门达尔；哈佛大学的 A. J. 迈耶；美国驻外事务处的杰里·尼森逊和菲利普·H. 特雷齐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罗索夫斯基和科博·奥达卡；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理查德·L. 沃克；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馆长路易斯·B. 赖特；我的兄弟、在国务院工作的约翰·帕克·杨格；我的儿子艾伦·杨格，是他建议本书用现在的书名。我的姐姐莎拉·阿黛尔·杨格不辞劳苦，悉心准备了本书手稿。我的妻子内莉·梅·杨格则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我非常宝贵的建议、批评和鼓励。

当然，对于本书中的谬误或疏漏，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士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阿瑟·N. 杨格